

※ 陳子展研究專輯 ※

我的祖父陳子展

陳祖蓀^{*}

序

至少在二〇一八年之前，我的人生中沒有打算寫關於祖父陳子展的回憶。理由不外乎兩個，一是自己水準不夠；二是寫有名的祖父，總有抬高自己之嫌。

從小跟祖父一起生活了近十八年，作為家庭一員，儘管離祖父過世也已過了很多年，但我仍然很難從外面的角度去審視祖父。直到二〇一八年，有三件事成了我寫祖父的契機。

第一件事是二〇一八年三月再訪復旦時，偶遇復旦大學校史館副館長錢益民先生，他給了我他們收集到的祖父上世紀三十年代時寫的雜文以及資料，並囑我寫一些回憶。

第二件事是二〇一八年秋，復旦大學中文系舉辦了「紀念陳子展先生一二〇周年誕辰暨《陳子展文存》出版座談會」。我和妹妹一起作為第三代，出席了跟祖父有關的活動，也是第一次親身感受到外界對祖父的目光和評價。跟我聯繫此事的就是上述的錢益民先生。

第三件事是在上述的座談會上，偶遇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史甄陶老師，那天，她發表的題目是〈陳子展先生《詩經》譯注之前後期轉變芻議〉。迄今為止，談陳子展的人很多，但一個生平跟祖父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卻在研究陳子展，而且我能與之相遇，實在是人生中一大幸事。

這個座談會觸發了我心中從來不曾萌發的意願：為何我不寫一寫祖父的事情呢？能將祖父伏案執筆書寫《詩經直解》和《楚辭直解》的情景還原的人，大概僅

* 陳祖蓀，日本青山學院大學中文講師、外務省研修所中文講師。

我而已。

上述的三件事，都發生在祖父誕辰一二〇周年的二〇一八年。這讓我覺得，大概是冥冥之中，祖父在告訴我，是寫的時候了。



我們姐妹和史甄陶老師的合影

我出生時，就跟祖父生活在一起，那時，祖父已經是個老者。他手握毛筆，伏案書寫的樣子，是我們家的日常風景。父親偶爾會說，你祖父以前跟魯迅先生他們一起寫過很多雜文，也很有名等等。但是祖父生前，我幾乎沒看見過什麼他的文章，一是家裏不提，二是家裏沒有。當我決定嘗試寫祖父的生平事蹟時，開始翻閱資料，這才醒悟到，原來祖父是個於中國文學史、於未來的《詩經》和《楚辭》的研究者來說，都是不可迴避的重要人物之一。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父親去世後，我在父親存放舊物的盒子裏，找到了祖父留下的遺囑和交代。其中一份比較完整的交代，共四頁，從表達內容和還算比較工整的字跡來看，估計寫於反右時期。

由於祖父在世時，我沒有向祖父做過類似採訪的事情，所以這份祖父自己寫的交代文章就成了很寶貴的資料。然後，我從收集他人的回憶文章著手，想從眾多零零碎碎的內容中，找到一個比較完整的祖父形象。

介紹一個人的人生，是件很難的事情。祖父九十二歲的人生是完全無法還原的。充其量，我能寫的只是像展覽館裏陳設的作品那樣的介紹，或謂之解說詞。即

[illegible][illegible]

事，他是我母亲沙咏花和养父第一女儿沙虎妞的亲弟弟。这两小叔在童年时结为兄弟，结一纸兄弟之谊，他能够理解兄长。他们都知道我有一种怪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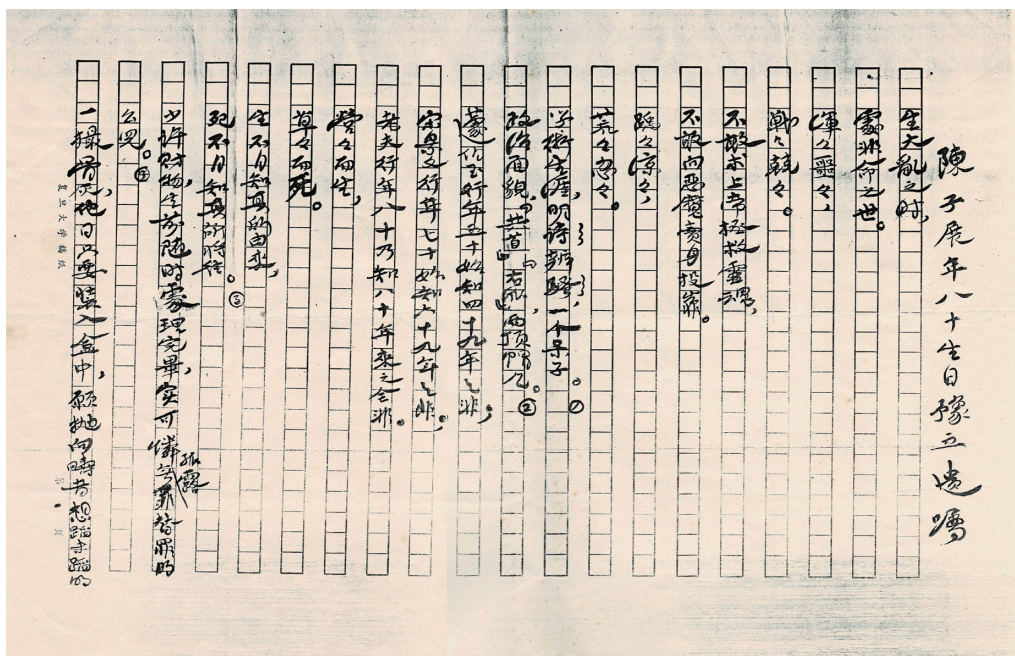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陳子展〈交代手稿〉

便如此，身為其後人來整理的話，也許會讓世人看到一個更加完整的陳子展人生。

我想從兩個角度來整理祖父的生平：一是按祖父人生的時間順序來寫，二是從我跟祖父生活在一起的角度來寫。

一、遺囑，交代，闡釋自己的人生



陳子展八十歲生日預立遺囑

生大亂之時，

處非命之世。

渾渾噩噩，

戰戰兢兢。

不敢求上帝拯救靈魂，

不敢向惡魔賣身投靠。

踽踽涼涼，

荒荒忽忽。

學術生涯，明《詩》辨《騷》，一個呆子。^①

政治面貌，「共首」「右派」，兩頂帽兒。^②

遽望行年五十始知四十九年之非；

宋景文行年七十始知六十九年之非；

老夫行年八十乃知八十年來之全非。

營營而生，

草草而死。

生不自知其所由來，

死不自知其所將往。③

少許財物，生前隨時處理完畢，實可憐孤露無罪替罪的么兒。④

一撮骨灰，他日只要裝入盒中，願拋向疇昔想蹈未蹈的東海。⑤

別矣祖國！

別矣同胞！

一九七八年古曆三月二十四日

陳子展時年八十有一生辰預立遺囑親筆

附注：

- ① 我一生教書糊口，賣文為活，其所撰述無可觀。此晚歲病中所寫有《詩經直解》、《詩三百解題》與《楚辭直解》、《楚辭解題》，惟《詩三百解題》一稿未及親自核完。此皆付與么兒志申保存，倘蒙組織上索取付印，他當無條件呈獻。
- ② 無論敵人友人各為我扣上一頂政治性大帽兒。先後不斷苦我五十年。父母生我，項背強直，得以硬挺過來。
- ③ 但知我生於湖南省長沙縣、靖港格塘、邱家堂陳家老屋之一，八槎子免上一戶農家，時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月二十四日。父字德慎，母姓熊氏。同母兄一、弟一、妹二。父母兄弟死於我四十歲前。
- ④ 待我心跳停止，即日運往附近殯儀館儘早殯殮，不必訃告親友，不必開追悼會。我不自知其靈魂之有無也。
- ⑤ 〔遺失〕

英國哲人休謨在自傳的開頭寫道：「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得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而祖父陳子展只用了一九二字，惜字如金地對自己的人生做了一個概括。雖似不乏悲觀之處，但能如此簡短書盡自己的人生軌跡與時代糾葛，實在令我這個後人感到震撼。

我手頭有三份祖父生前寫的遺囑，分別為七十歲、七十八歲和八十歲時所立，前兩份內容多涉及財產分配，惟八十歲這份概括了自己的人生輪廓。

我就順著祖父的這份遺囑以及自我交代的手稿來整理一下祖父的人生軌跡。

（一）湖南長沙時代（1898 年—1927 年）

1. 「知識分子的起點」——雪夜投靠

我是 1898 年生於湖南長沙靖港青峰山邱家塘陳家老屋，當地的一個農家。初讀私塾六年，學了作八股文，又讀高小一年。1912 年入了不收學膳費的長沙縣立師範學校，校長是徐特立先生。入學試驗時，我記錯了日子，從一百廿里的地方赤腳到校，已是晚上，又冷又餓又疲乏，請求補考。出題考是周竹安先生，作文題是〈雪夜投考記〉，做完了，其他試題無力再做。放榜時，還是深蒙破例錄取。這就是我至今不忘徐、周二先生的原因，也就是我作為知識分子的起點。

——〈交代手稿〉

祖父陳子展，原名炳堃，出生於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那一年，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百日維新，或稱戊戌政變。祖父一生幾乎沒有詳細談及過時代的變遷對自己人生的影響，但從他將中國近代文學的起點劃分在一八九八年，我認為，戊戌維新運動對他的歷史認識還是有很大影響的。他在第一本著作《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中，對自己出生的那年所發生的短暫的政治運動，有如下的評論：

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指「戊戌維新運動」），實在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也就是中國由舊的時代走入新的時代的第一步。總之：從這時候起，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8 年）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祖父十三歲，正當是少年多感思春期。當年十月十日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兩個月後，湖南跟其他十五個省分一起宣布脫離清政府，長沙成為宣布獨立建立革命軍政府的地區。對一個如此巨大的時代變革，少年陳子展是不會沒有感受的。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

人生最初的十四年，就經歷了三個時代的變遷，這種歷史變化的衝擊，無疑對

祖父的精神世界、價值觀的形成，有著很大很深遠的影響。這也可以說是「生大亂之時」的時代背景。

一九一二年冬天，祖父雪夜投考長沙縣立師範學校。這是一個在我們家也是常常被提起的故事，我不僅從父親那裏聽過，也從祖父那裏聽過。為此，我還曾經在一九九〇年二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發表過一篇題為〈永遠的故鄉〉的散文，文中寫到：「在今日安詳、溫和的公公（筆者按：湖南人稱祖父為「公公」）身上，再也找不出當年那少年的身影，雖然依舊有一股執著勁兒。我喜歡這個充滿了冒險和浪漫的故事，我愛這個故事中的主人公。」

這篇文章發表在祖父離世的前兩個月，父親把文章念給祖父聽，聽說祖父含笑點頭稱是。無獨有偶，周竹安後人在一篇回憶中也證實了這段往事：

周竹安在長沙教育界的經歷，還有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1913年初，正值寒冬，一位名叫陳子展的年輕人冒著風雪，從長沙鄉下日夜趕路步行80里，報考長沙師範學校。抵達學校時已是晚上8點。當陳子展得知早過了報考期限時，急得大聲哭。正在校留守的周竹安見狀十分同情，將他帶入校內，並以當時的雪景命題，要他寫一篇〈雪夜趕考記〉。陳子展很快寫就一篇作文，周竹安閱後暗暗叫好，遂極力向校長徐特立推薦，陳子展因此被學校破格錄取。陳子展後來擔任復旦大學教授長達56年，是一位繼郭沫若、聞一多之後研究古典文學卓有成就的文史專家，著有《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詩經直解》、《楚辭直解》等。

——〈在迎接長沙和平解放的隊伍中父親抱著我默默流淚〉

（《三湘都市報》2011年3月2日）

在年分上，兩篇文章略有出入，但事實上基本是一樣的。這篇文中「急得大聲哭」是我第一次看見的文字，至少祖父和父親都沒有提到。一個少年在寒冬雪夜從鄉下跑去投考，遭到拒絕後，絕望大哭，這大概給周竹安留下了深刻印象吧。也許有人會問，考個試，何至於如此慟哭？其實，這個故事並不是我年輕時想像的那麼浪漫，而是有個悲慘的背景。

祖父幼年喪母，其父再娶，使祖父飽受繼母虐待，得知縣立長沙師範招生，而且「不收學膳費」，便下了離家出走的決心。據祖父自己說，鄉下少年並不知道招考日期已是陽曆，仍按農曆行動，所以整整誤了一個多月。腰間別著唯一一雙草鞋，赤腳深夜趕到學校，才把鞋穿到腳上。敲開大門，當知道自己搞錯了日期時，

那個抱著誓不回老家決心的少年嚎啕大哭起來，是一種怎樣的絕望！因而對徐、周二，祖父一直是感恩不盡。

祖父在晚年著述的《詩經直解》〈邶風·凱風〉的注評中寫道：「余幼為繼母所苦，幾喪其生。及長，心感時人非孝之說。每讀此詩三家遺說，不能不為之悵觸，而為之悵惘不知云。」在祖父的研究著作中，這是極為罕見的流露私人情感的地方。而祖父更把這個破格錄取看作「是我作為知識分子的起點」，這可以說是他給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定位。

2. 胃病與「腦病」

1917 我開始教小學，四年之中有三年和周竹安同事。1921 我以積存小學收入之錢到南京東南大學求學。1922 冬，我因胃病、腦病併發，輟學回到長沙。

——〈交代手稿〉

祖父在三十年代的雜文中，多次提及自己的胃病。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還專門發表過一篇題為〈胃病〉的雜文，開頭第一句就是：「胃病真是一種可怕的病，尤其是和文人特別有緣。」之後又寫：「十年以前，我犯了很嚴重的胃病，臥在湘雅醫院，採用減食療法，挨餓差不多一個月，才算餓好的，從此不敢吃辣椒了。」這裏提到的胃病，應該就是一九二二年那場大病了。文中還提及詩人蘇曼殊、作家羅黑芷等人都死於胃病後，總結說：「自然，湖南人患胃病並不稀罕，因為他們沒有辣椒，辣得要出眼淚的辣椒，是不能下飯的。」

在一位網民寫關於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中，我偶然讀到了跟當時祖父有關的小插曲：

1980 年，時年 88 歲的復旦大學教授陳子展先生回憶說：「我在南京上大學時得了胃潰瘍。一次我正在讀書，一陣陣劇痛襲來，簡直使我要發瘋了，我便無可奈何地來到燕子磯，想跳江了卻一生。我抬頭望去，只見木牌上寫著『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終於打消了輕生的念頭。」

——〈一個著名的「自殺勝地」因一個人的到來寫了六個字，

拯救性命無數〉（網友「大理寺卿」，2019 年 1 月 31 日）

沒想到，祖父竟然會胃疼到想要自殺。只是，網上的這篇文章把陶行知立牌的時間寫為一九二七年，這似乎與祖父在南京求學的時間不一致。如果陳子展見過陶行知



今人所建石碑

先生寫的木牌的話，木牌當是一九二一年左右就有了。而且，一九八〇年的話，祖父也不是八十八歲。世人寫文章，在數字上大多馬馬虎虎。不管怎麼樣，祖父後來與陶行知先生有過來往，還曾向陶行知先生贈過對聯。

胃病好像是陳家的遺傳，雖然我們都不吃「辣得要出眼淚的辣椒」，但是我父親也常常鬧胃病，我妹妹也常說自己胃不好。而我在離開上海前也常常胃痛，到了日本以後才不再發了。

至於祖父的腦病，雖然祖父在多篇文中提及，但是無人深究，大概覺得「病」就是負面的話題，更何況是「腦病」。但我讀祖父提及「腦病」的文章，覺得其中還是有很深的意義。比如，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發表在《申報·自由談》的〈章太炎先生之瘋癲哲學〉裏，全文引用了章太炎本人談及瘋癲與神經病的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

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濟；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

這是章太炎在一九〇三年作的白話文演講，對這篇大談「神經病」的文章，祖父的評價是：章太炎先生在三十年前實不愧為一思想比較進步之革命家。為了說「能想也不敢說的話」，為了「百折不回，孤行己義」，直接掛牌「神經病」，在一個政治腐敗的時代，倒也可以說是一個方法。「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濟；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我認為，這或許與祖父稱自己患有「腦病」有相吻合之處吧。

現在我們已經從最新醫學研究角度知道，腸胃和大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兩者互相影響。而且，我在日本大學院研究日本近代文學作品時瞭解到，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作家文人似乎都很容易得「腦病」。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現代日本的開化》中指出，日本近代社會的文明開化是來自外部的、不得已的，這種方式

的文明開化妨礙了民族獨立，因此，「最好在儘量不陷入神經衰弱的範圍內，做一些內在型態的變化，以求保全一點體面，我覺得除此以外別無他法」。十九世紀前後，歷史的轉折並不意味著文化的多元化，也還不存在包容的價值觀。日本也是，中國也是，原有的文化受到擠壓、受到貶低，甚至自身內部也有人認為，應該拋棄傳統的文明和文化。即要麼全面拒絕，要麼全面接受和全面拋棄。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祖父的所謂「腦病」也當是時代之病。外來思想跟傳統文化的衝突，給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刺激的同時，一定也帶來了很大的困惑和苦惱。祖父在上述雜文中指出，章太炎所論及的神經病是「極有見地，非僅章先生為自己解嘲已也」，這大概也是表示贊同的評價吧。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可以解釋為，「腦病」是壓力大的象徵，「胃病」也即由此引起，兩者可謂是現代病的結合體。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與文革的交代中，祖父也曾多次提及自己有「腦病」。對祖父來說，前半生的「腦病」意味著時代的「思想革命」，而後半生的「腦病」則真正是自嘲與無奈。

3.「十九歲那年，我與毛澤東同生」

1922 冬，我因胃病腦病併發，輟學回到長沙，幸而住進船山學社自修大學湘江補習學校，養息了一年，病患稍癒。這一年間我開始和政治人物接觸，補習學校校長李維漢先生，教員中有師範同學共產黨員曹伯韓等，他們請我教書，我因養病未就。

——〈交代手稿〉

毛澤東長於祖父五歲，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當時祖父就讀的長沙師範和第一師範的校長都是徐特立，教員也是同在兩個學校兼職，所以，要說祖父陳子展跟毛澤東是師兄弟的關係，也不為過。而且兩人均是自己學校的足球隊員，有過比賽。據祖父回憶，毛澤東因為個子較高，所以當守門員。

他守門時，頭腦冷靜，反應靈敏，在場上兩眼總是盯著滾來滾去的足球。我們的射門總是被他「沒收」。

——〈19 歲那年，我與毛澤東同生〉

（《文匯報》1988 年 7 月 6 日）

關於毛澤東踢過足球一事，後世大概僅有祖父一人提到過。

且說輟學回到長沙後，「住進船山學社自修大學湘江補習學校」的宿舍，和夏明翰是室友。祖父一邊養病，一邊在自修大學聽課。

據當時在自修大學與夏明翰同住一室的陳子展（解放後任復旦大學教授）回憶：毛澤東在自修大學「講歷史唯物論、講辯證法、講科學社會主義，學《國家與革命》、《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歷時7年。三論三篇造就了一代共產黨人中堅毛澤民、夏明翰、羅學瓚、陳佑魁、毛澤覃等。

——王大象〈見證夏明翰壯烈就義〉

（《檢察風雲》2011年第14期）

當時自修大學的地址為清末船山學社社址，為三進三開間磚木結構建築。中共「一大」以後，毛澤東、何叔衡回到湖南長沙，著手建立湖南地方組織，並創辦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學校——湖南自修大學。錢從哪裏來？仇鼇時任船山學社社長，對毛澤東、何叔衡等的活動全力支援，不僅為湖南自修大學提供了部分房屋和每月四百銀元經費，還擔任校長。仇鼇，字亦山，湖南汨羅人，曾襄助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的武昌革命。

由於毛澤東他們需要更多的經費，所以還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專門招收年齡比較大的文盲、由私塾改學新學的學生，以及農村學校課業不夠升學的人，而且是男女兼收。補習的科目有英文、數學、國文、歷史、地理五科。補習學校大受歡迎，第一期就招收了一百二十餘名學生，教員由自修大學學員充任，何叔衡、夏明翰、易禮容、羅學瓚、夏曦等都是辦學的骨幹。可惜好景不長，自修大學和附屬補習學校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被湖南省省長趙恒惕勒令取締，罪名是「所倡學說不正，有害治安」；此時兩校學生已達二百多名。據說，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給起的。一九二〇年春，毛澤東在給新民學會會員陶毅和周世創的信中提到，「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中共最早的幹部學校〉，《三湘都市報》2011年7月18日）。

祖父在「養息的一年裏」，雖未去補習學校教書，但住在自修大學宿舍，感受這種氛圍，並去旁聽毛澤東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課，是很自然的選擇。對祖父是否在自修大學當過教員，由於手頭沒有足夠的資料，無法證實。從現在收集到的資料來看，都說祖父在自修大學當過教員，在此，以祖父的〈交代手稿〉為準。

總而言之，陳子展跟毛澤東認識、相處的時間，從長沙師範學校時期就已經

開始，應該早於他自己說的「十九歲」，互相有過交流的關係，直到一九二三年自修大學被迫解散，或後來的馬日事變為止。之後，兩人似乎再未有過交往。聽父親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把恩師徐特立請進北京，而徐老先生又來請我祖父去當自己的秘書，祖父謝絕了。在復旦大學吳中傑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我看到了祖父的一句話，亦可算作一個回應吧。

共產黨困難時，我應該幫忙；現在共產黨勝利了，我就不必再湊這個熱鬧了。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老復旦的故事》，1998年，江蘇文藝出版社）

不管怎麼樣，從一九二一年的東南大學起至自修大學，及至馬日事變前夕，祖父一定大量閱讀了那個時代的各種書籍，吸收了各種新思想，並形成了自己的思維方式及研究方向、方法。可以說，在那六年左右的時間裏，祖父為自己定下了人生的方向。

順便提一下，自修大學設在原船山學社。王船山，湖南衡陽人。祖父晚年出版的《詩經直解》的扉頁上，引用了王船山的詩句：「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每打開這一頁，都讓我有種震撼感。我覺得，要瞭解祖父的人生和思想，必定要讀懂王船山，此次就此打住。

4. 「我的頭值三千大洋」——馬日事變

1923-1927，我在長沙幾個中學教書，如修業農業學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長郡中學、楚怡中學、長沙縣立師範、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等校。在這一期間，我曾由曹伯韓、廖伯華介紹加入了改組後的國民黨。1926年春夏間，北伐軍進入了長沙。次年春間，我由謝覺哉、龔飲冰介紹在他們主持的《湖南民報》當主編輯。隨後又由共產黨員賀樹介紹我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政治部當秘書。他是宣傳科科長。從此，我認識了賀樹、張瓊夫婦。當時非共產黨員可兼職兼薪，照是我先拿長沙師範和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教員本薪。這兩個學校的校長都是徐特立先生，後一校總務主任是熊瑾玎先生。他們都知道我素有神經病。

就在1927年的五月廿一晚上，唐生智部下何鍵等發動反革命叛變，即所謂「馬日事變」，大舉「清黨」，瘋狂屠殺共產黨員。次日，賀樹夫婦來到我

家，我和他們隨唐錦連避居其鄉下的家裏，他家是徐特立、熊瑾玎兩家的近鄰。經過十多日，我們回到了長沙城。這時，我早已和周竹安同居一室。謝覺哉先生避居在我們樓上。其時，由我出具保甲聯法，保證鄰居十家無共產黨員，否則同罪。謝覺哉先後約居月餘而去。其間謝、周兩人表示願意介紹我入共產黨，當由省黨組織負責人彭公達找我談過一次話。不久彭被捕，謝、周二人都要避開，就來不及和我辦入黨手續了。隨後反動派軍警就來抓捕我，時在九月底，恰巧我出門避難，前往武漢，他們撲了空，把我的愛人和兒女捉去。（聽說後由柯藍的父親托人保出）其時周竹安的妹妹西均前來輪船碼頭，悄悄囑我和同行的唐錦連特別警惕。到武漢也是十月初，敵人對我和徐特立、熊瑾玎、謝覺哉、李維漢等二十幾個人下了通緝令，懸賞捉到一人賞三千元。我在武漢會見了熊瑾玎、陳雲濤等人。熊借給我一點旅費，我和唐君就經過南京到上海了。

——〈交代手稿〉

「馬日事變」，是國共兩黨交惡歷史上的一次大事件，就無須我多說了，但祖父親身經歷的這一段，叫我讀後，心驚膽顫，為之捏把汗。曾與祖父同住一室的夏明翰於次年三月慘遭殺害，今天，已無從知道這位中共早期的黨員跟祖父在自修大學的宿舍有過什麼樣的交流。而交代文中的「兒女」中的「兒」即是我父親。小時候，也常常聽祖父講：「我的頭值三千大洋，哈哈哈哈哈！」權當個故事聽聽而已。

因「馬日事變」，祖父與當時中共著名人物一起被叫作「共首」，正如遺囑中所寫，「政治面貌，『共首』『右派』，兩頂帽兒」，這是第一頂。

遺囑中的「處非命之世」，當包括這段歷史。

（二）上海時代（1928年—1937年）

我住在同學田漢家，因為田漢弟弟田沅（即田壽麟）讀小學（時），他的學膳費是由我和黃芝岡（近現代戲曲史家、民俗學家，祖父的好友）兩人負擔的，所以田老太太（即田漢的母親易克勤）很歡迎我。此時，田漢正擬辭去上海藝術大學校長，自辦南國藝術學院。1927年冬到1928年秋，我就在南國藝術學院義務教書。

1928-1937的十年裏，我在上海賣文為活，間或兼任大學每星期兩三小時的課，先後經過的大學有群治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政學院、滬江大學等

校。

——〈交代手稿〉

一九二八年，祖父三十歲。春天，攜妻兒逃到上海後，立即就開始在田漢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上課。雖經歷了馬日事變的生死場，但是，驚魂未定、隱匿藏身這種詞彙似乎與祖父無緣。當然，需要馬上自己賺養活家人的生活費，來不及恐慌，也是一個理由吧。

在其後的近十年裏，祖父筆下碩果累累，造就了人生中黃金時代。語言會起連鎖反應。尤其是在同一時代的語境中，這種連鎖反應會來得更快、更有刺激。

1. 重視文學史

余性近文藝，徒以迫於生計而未嘗專精致力；素不好過問政治，而政治之紛亂，每使余求斗筲之食而亦不安。今年春，避亂滬上，得與老友田壽昌先生共晨夕，研討觀摩，而終身從事文藝之志已決。

——《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自序》（1928年9月5日）

上課一學期後，祖父就把講稿整理成了《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一書出版。這是一本關於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研究著作，至今仍是該專業的學生必讀之書。首先，它把近代文學的起源定在戊戌年間，即一八九八年，而不是通常所說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即所謂的新文學之年。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第一本專門有論及〈翻譯文學〉章節的近代文學史著作。

一九二九年，祖父又出版了《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在書的〈例言〉（一）中，開門見山地就寫到：「本書繼胡適之先生《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及拙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而作。」頗有公開向權威挑戰之意。在這本書裏，祖父又指出，早於戊戌政變四年的甲午海戰失敗，使得民族存亡問題日益凸顯，才有了日後的變化。

在拿到這兩本著述的稿費後，祖父也像他那個時代的諸多文人一樣，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途。關於對日本的印象，祖父後來幾乎沒有公開提到過，只是在五十年代的〈交代手稿〉中做了如下說明：

1929年春，我曾因先後得到《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兩本書稿費去日本學日文。田沅同行，田漢不給他旅費，他的費用只好由我負擔，到夏秋間，我就因錢用完回國了。我因當面責備田漢不給田

沅旅費，從此田漢就不和我往來，只聽說後來他入了共產黨，並為左聯負責人之一。不久又聽說他被捕解往南京了。

——〈交代手稿〉

小時候，曾多次聽祖父說，當時中國的銀元可以直接在日本用，不用兌換。他帶了好友田漢的弟弟田壽麟去日本，旅費什麼的都由祖父負擔，所以，祖父常對我說，「旅日的盤纏被田老大（田漢是長子）騙走了」，很是氣憤的樣子，並說由此和田漢斷絕來往。但當我把這段內容告訴我的二姑時，她很驚訝，堅決表示不同意。一九二九年出生的二姑說，她小時候，田漢和安娥經常來家裏玩，一起吃飯，一起唱歌，田漢作詞的〈賣報歌〉也是直接從安娥那裏學的。

祖父絕不是個小氣的人，不會因為照顧田漢胞弟，少了幾個錢就跟田漢失去友情。唯一能推測的是，〈交代手稿〉大概寫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期間，當時田漢也是著名的大右派，這麼寫，是為了洗淨互相之間的關係吧。

不管怎麼樣，三十年代早期，祖父的文章多為關於中國古代文學的論文，如〈青木正兒的支那近世戲曲史〉、〈民間戲曲之研究〉、〈兩宋詞人與詩人與道學家〉等等。而著述方面，除了上述兩本關於近代文學史撰述以外，還有《中國文學史講話》（1933-1934年）、《唐代文學史》（1944年）、《宋代文學史》（1945年）。

我手頭有一套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因過於陳舊，生怕翻閱後紙張會脫落，一直未曾敢碰觸。二〇一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子展文存》中收錄了該書，使我有機會第一次閱讀，立即就為其研究方法的新穎感到吃驚。一般，我們在大學學文學史的話，都是按照年代進行，於是，文學作品與題材之間的相互關聯被所謂的歷史年代切成碎片，變成某段時間裏的一堆積累。然而祖父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卻按文學體裁鋪陳，〈上卷〉從《詩》三百一氣講到晚唐詩人，總結了詩的形成到發展的過程；〈中卷〉則以詞與戲劇的關係為重點；〈下卷〉專注小說的發展軌跡。

美國著名科學史家庫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指出，年表式的歷史課阻礙了我們去認識一門學科的發展進程（《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年）。祖父雖然沒有對傳統研究的方法提出過質疑，但是，從一九二八年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開始，祖父的著述中就已經有了文學體裁承前繼後的觀點。這種不以年分來切斷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的研究方法，就是今天看來，也是相當新穎的。

2. 早年以雜文出名

曾為海豚出版社的《蓬廬絮語》盡心盡力的康凌先生在題為〈作為雜文家的陳子展〉（《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8年）一文中，開頭第一句話就是：「陳子展一開始寫雜文，主要是因為窮。」帶著妻兒剛到上海，當然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寫雜文，或許真如康凌的評述，是出於當時的生活困境。如果僅為生活的話，只要能拿到稿費，寫什麼都是可以的，但從祖父發表的雜文內容看，批判當時社會的內容占了很大的比例，鋒利、辛辣、幽默，體現了雜文的所有特點。

讓我不可思議的是，剛到上海的祖父已經赫然躋身於上海文壇。一個完全沒有家庭背景、沒有顯赫學歷，也沒有什麼業績的年輕人，社會就這麼簡單地承認並接受了他！？這是今天很難想像的事情。

或許這是一個時代所帶來的機會，但是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又取決於個人的行動和價值取向吧。祖父曾在雜文〈翻案與翻筋斗〉（《立報》1937年4月28日）中說，寫文章的人「若朝支配者的勢力走，站在衛道宗聖，或者獻媚支配者的立場，就只見其笨，甚至只見其無恥而已」。「前進的雜文家」鄙視這種「獻媚支配者」的無恥立場。

假如你是一個書生，無論你是由於真理的信念，或者基於正義感——你就得準備擔受一切，走上你認定應該走的路了。

雖然這只是一篇文章中的句子而已，但是足以表明祖父寫作時的立場。

作為雜文家，祖父自然和魯迅有過交往。祖父發表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自由談》上的〈正面文章反面看法〉，曾讓魯迅叫讚。兩人互相關注對方的雜文，並在自己的文中積極引用或呼應。有人評說，陳子展的雜文一半是「魯迅體」，一半是「知堂體」，好像也是有道理的。

一九三六年，魯迅去世。祖父在《悼念魯迅先生逝世專輯》中發表了題為〈我們所以哀悼魯迅先生〉，對自己與魯迅的關係有過如下的敘寫：

平日絕少機會接近，只在黎烈文、林語堂的宴席見過兩次，在北新書局門市部碰過兩三次。不曾和他通訊往來，得過他的一通手笥。……聽到魯迅逝世的消息，比死掉了一個最敬愛的師友還要震驚、歎惋，竟一時悵悵惘惘、彷徨徨，心中好像失了主宰一樣。

祖父走在為魯迅送葬的隊伍中一事，也成為當時報導的一個亮點。

我小學時，尚是文革後期，課本上有很多魯迅的雜文，其中一次看見注解說，

「這是魯迅對反動文人陳子展等人的回應」，把我嚇得要死。回家後，戰戰兢兢把課文給父親看，父親淡淡地說：「現在的人知道什麼，當時的文壇互相批判也都是事先約好的。」據父親的解釋，三十年代的文章，為了引起社會矚目，報社等會立一些題目，讓多位作家從不同角度去評述、討論、批評。而在那個只捧魯迅的文革時代，被魯迅點名批判過的人則統統成了「反動文人」。

據康凌說，當時祖父的稿費跟魯迅一樣，一篇拿十元，這也印證了我二姑的回憶。二姑說，在上海安福路的日子是祖父母一家人最幸福的時光。祖父作為雜文家，有多家雜誌的約稿，又是《申報》等報刊雜誌的專欄作家。每到週末，家裏或來客人，或去當時剛建成的東洋最高大樓——國際飯店，吃喝打麻將。客人都是當時的文人、作曲家等。二姑還說，田漢常拿來剛譜好的歌曲，來讓兒時的二姑唱。

3. 關注經學

在研究《詩》、《騷》之前，祖父曾寫過多篇有關《孝經》的論文，令青山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專家橋本秀美（中文名：喬秀岩）先生看後，大呼「過癮」。而史甄陶認為，陳子展對歷代經學注疏的重視程度，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相當罕見，彌足珍貴。

祖父第一次翻譯《詩經》，可以說是時代的影響和來自他人的語言刺激。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詩經語譯》的序中，祖父提到在女子書店偶然翻閱到《詩經情詩今譯》，因而想到自己也可以試一試。而一九三四年前後，祖父正與陳望道、曹聚仁等人一起力推「大眾語運動」。雖然大眾語運動時間不長，卻可以看作是在五四運動白話文之後，提出的又一個新的語言挑戰。祖父在〈大眾語與詩歌〉（《社會月報》，1934年，第1卷第3期）中，開門見山直言：

什麼叫做大眾語？

這裏所謂大眾語，包括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

因此，當祖父陳子展看到《詩經情詩今譯》時，馬上意識到，用「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翻譯《詩經》，大概是對大眾語的最好實踐。這也是祖父與《詩經》的第一次握手。一九三四年的《詩經語譯》只有上部，到一九八三年的《詩經直解》，幾乎相隔了整整半個世紀。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後，祖父開始沉默，晚年只埋頭於《詩》、《騷》的研究。

4. 詩人

雖無人這麼評價祖父，但祖父留下了大量的舊體詩是事實。《詩》、《騷》的翻譯，用的則是白話文，即為現代詩體。此外，還有大量的對聯、打油詩。在《申報》的「蘧廬絮語」欄中撰寫雜文的同時，也在其他雜誌上以「蘧廬詩語」專欄，發表舊體詩、新體詩，或做詩評。

幾年前，曾有人在寫一篇關於棚戶區拆遷的文章中，提到祖父在三十年代寫的詩〈棚戶寫照〉，大概是不知道祖父的事情，看是詩體，就把「詩人」的桂冠戴到了祖父頭上。

我覺得特別應該一提的是，一九四〇年，祖父接到楊樹達先生的推薦，曾提拔過還不到三十歲的魯實先先生到復旦當教授，並為魯先生的《殷曆譜糾譌》一文用舊體詩寫了〈論學詩〉（三組），其中〈龜曆歌〉則為七言長詩。正如祖父在一九四五年所記，〈龜曆歌〉發表在復旦大學湖南同鄉會會刊上，「外間絕少得見」。我也是在《陳子展文存（上）》第一次讀到〈龜曆歌〉的全文；雖然年輕時曾聽家父多次提及祖父挺住中文系的壓力，提拔魯實先先生，並寫就〈龜曆歌〉一事。

（三）重慶北碚時代（1937年—1946年）

我是1939重新登記加入國民黨的。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合作，一般舊知識分子對於國民黨認識不清，所以全校教職員大概是集體加入的。當時召集的一次區黨部成立大會，我沒有等到開完會就走了。就在那年7月，我的長期患病的前妻死了，兒女都還小，家裏事情比較多，心情也十分痛苦。

——〈交代手稿〉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十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近於淪陷，復旦也決定撤離上海。然而由於事態發展得太快，大學不得不自己尋找合適的新校址。復旦從廬山找到貴州，最後在重慶北碚夏壩東邊的黃桷鎮艱難復校。五千餘里的路程，充滿艱辛。

在復旦大學眾多師生乘坐的永利號上，也有祖父一家六口。據二姑回憶，隨一家同行的還有祖母的表弟劉志恒（後改名為劉昭曙）。當時八歲的二姑對此次轉移的記憶是一次「遊山玩水」似的旅程，「一路玩過去」。已過九十的二姑記憶好得

驚人，更令我吃驚的是，她對旅程是「遊山玩水」的這個記憶和感受，在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中也有相似的表述。

一家在下船後，有個短暫的分離。祖父一人隨大學去重慶北碚，找安頓一家人的房子；祖母則和表弟一起帶著四個孩子回了一趟長沙的娘家。對孩子們來說，外婆家是個快樂的地方，家裏有很多大人，戶外是遊玩的好去處。孩子們盡情地調皮，不受任何拘束。二姑回憶說，當時十二歲的我的父親坐上荷塘裏的小木盆，不料就這麼飄了出去，嚇得哇哇大哭。想起父親晚年一直說，想回湖南老家，大概指的就是這個外婆家吧。在聽二姑回憶前，我一直以為父親出生後就離開了湖南，原來竟是有過這樣短暫且美好的時光。

一家人在重慶北碚的復旦教職員工住宅重聚，但是祖母的病情卻日益加重。由於重慶沒有上海的治療條件，祖父讓中醫來給祖母看病。我父親帶著二姑，爬山去醫生那邊取藥。祖母對祖父很生氣，說：「這麼小的孩子，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但是，二姑說：「我們願意啊，只要能救媽媽的命。」

但是，祖母最終還是沒能扛過北碚艱難、惡劣的生活環境，在三十九歲時，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北碚的復旦大學

我在復旦中文系教授、女詩人黃潤蘇的〈北碚憶往〉（《澎湃新聞》2018年5月3日）中找到了祖父在北碚的身影：

當時，我的老師有陳子展、馬宗融、章靳以、方令儒等著名教授。……陳子展先生，他為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我記得正好是唐宋這一段。同時，他又讓我們修習「各體文習作」——是新文學派讓他去上課的——就是各種體裁

文章的寫作，我也去聽，所以陳先生和我們的關係也很深。有幾個下午，我們看到陳先生和他的兒子陳志申（陳志申當時大概十一、二歲，我們才大學二年級，也還不到二十五歲）一道，穿著都很樸素，就問：「陳老師，你們到哪裏去？」原來他們為了節省，就把飯煮成兩節，把這個飯送到他兒子的學校去，作為他們的中飯。你就知道，那時我們的教授的生活是多麼艱苦，把飯隨身帶著，背兒子去上學。

還有，我們食堂煮稀飯，每天早晨吃飯都要搶，去晚一點就吃不到了。有一天搶到最後，竟然發現一隻煮熟的老鼠，大家都倒胃口，但大家都說：你不能去怪廚房。我們吃的東西多糟啊！沒有辦法。當時，我們每個星期天坐船到北碚去，一人吃一碗排骨麵，就是一個禮拜的打牙祭。

今天，讀到這一段，幾乎讓我淚奔。這裏有我親人的身影，有我熟知的父親的回憶。小時候，經常聽父親回憶「紅燒肉、打牙祭」時，幾乎都是笑著聽過去的，還要調侃「又來了」。但是，在尋找北碚復旦的影子過程中，我一直為笑父親的紅燒肉回憶而內疚不已。

然而，儘管北碚的生活如此艱難，失去愛妻，但是，祖父仍然做著自己該做的事。一九三九年九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北碚聯誼會成立，祖父也參加了。我在一張老照片上看到祖父和當時著名作家端木蕻良、蕭紅在一起。那時離祖母去世後大約不到兩個月。祖父和蕭紅在同一鏡框內，讓我吃驚。

一九四〇年六月，田漢以左翼文藝運動組織領導人的身分來北碚視察時，祖父也一路陪同。（〈北碚發現田漢郭沫若墨寶 先後題詞見證重慶大轟炸〉，《重慶晚報》2013年12月17日）

還應當一提的是，在重慶的後半段日子裏，祖父有過一次新的婚姻。失去祖母時，祖父也才四十一歲，再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二姑告訴我：「我們都不喜歡新的媽媽，常常惡作劇。」當時，祖父把長女和長子（我大姑和我父親）都送到了寄宿學校，二姑講的「我們」就是她自己和小叔兩個人。在重慶北碚，兩個才十一、二歲的孩子，餓著肚子等父親回來做飯，這大概也是讓祖父下決心再婚的理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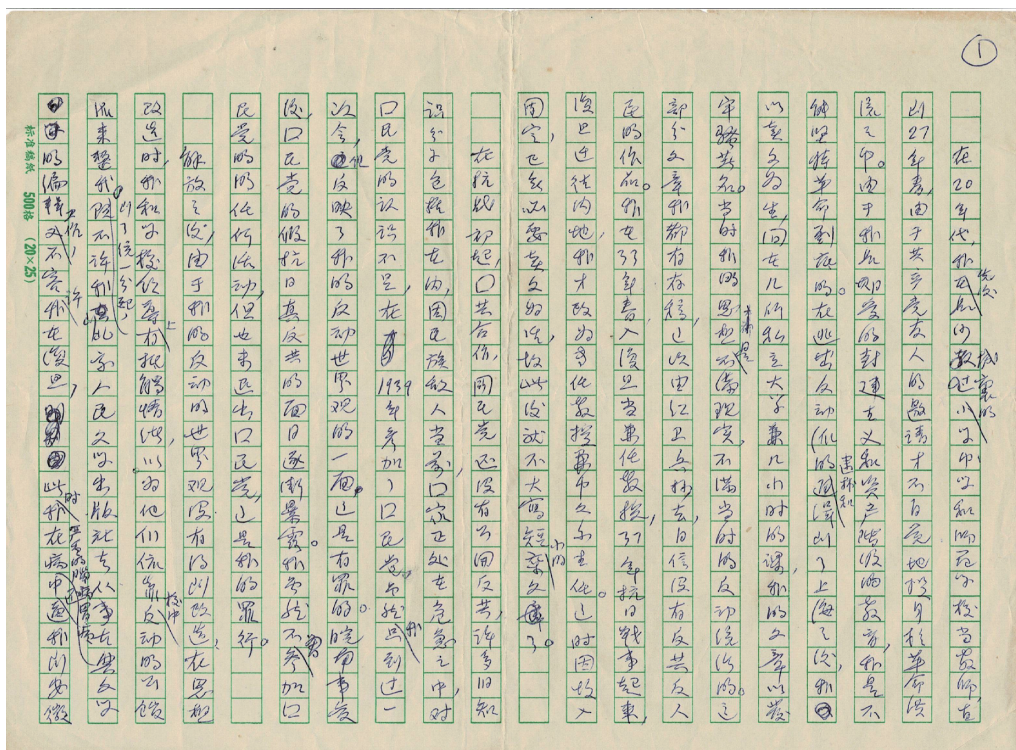
我小時候，只聽家裏大人都叫她「醜八怪」，依稀好像見過一次，一個胖胖矮矮的老太太，突然造訪，然後祖父就帶我們一起去了飯店。後來在俞汝庸的一篇文章裏，我第一次知道了一點祖父再婚的女性的事情。俞汝庸〈我所知道的陳子展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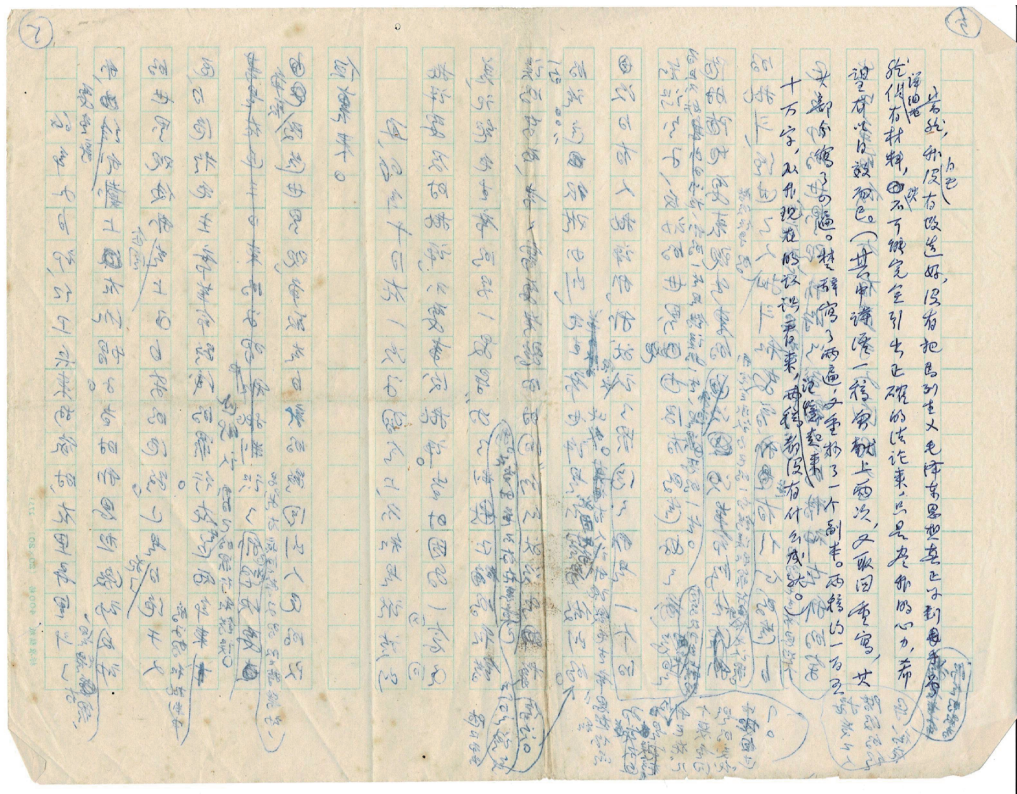
郭紹虞〉（原載《文匯報》2008年2月13日）：

陳子展的夫人周嫩士是我母親的表姐，我們稱她為嫩姨。當年，家父與陳子展同在復旦大學執教，起先，我們都同住在復旦家屬大院，後來，他們搬到吳淞路寓所，儘管距離遠了，但逢年過節還是經常往來的。在我的印象中，嫩姨與我們來往較多，這位姨夫陳子展到我家倒並不多。

這段婚姻應該是很短暫的，至少我出生時，家裏已經沒有這位夫人了。婚後一直和祖父同住在一起的母親，也只見過她一兩次。

（四）重回上海（1946年—1962年）





交代文章稿

新中國成立初期，祖父好像還是比較順利，參加過全國文藝代表大會，繼續當中文系主任。但是，進入五十年代後，思想政治運動不斷，知識分子的思想活動開始受到限制。祖父陳子展也不例外，從五十年代《文匯報》上對陳子展的批判看，可以想像他的惶惑和混亂。最初時期，祖父似乎還留著前一時代的精神特徵，幫同是復旦的英語系教授孫大雨說話，毫不客氣批評共產黨幹部。但是，五十五年前後，就逐漸地開始在各種交代中做檢討、反省，並道歉。這些交代書與其說是祖父想表現跟過去的自己徹底分手的決心，卻不如說是表達了萬般的無奈。我很難想像，曾經靠一支筆養活了一家六口人的祖父，竟然寫出如此拙劣的交代文章。大概是因為知道很拙劣，所以也會先寫真相，流露一些不能掩飾的自豪感，比如上述草稿中的第五頁背後，「《詩經》一稿曾獻上兩次，又取回重寫，其大部分寫了四遍。《楚辭》寫了兩遍，又重新抄了一個副本。兩稿約一百五十萬字」，然而大概是想到這是在寫檢討、交代，筆鋒一轉，「從我現在的認識看來，記憶起來，兩稿都沒

有什麼成就」。

一再交代、一再檢討，反覆在前文上覆蓋新篇。重讀這些交代文章，既能看到祖父的無奈，又令人感到荒誕。一篇篇歪歪扭扭的文字，展現的是歷史的荒唐與醜陋。

前面提到的俞汝庸一文中，還有這樣一段插曲：

「文革」開始後不久，有一天，一直賦閒在家的陳子展跑到復旦中文系想看看大字報，復旦師生都不認識他，他自報家門以後，據說整個校園都轟動起來了。原來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寄生蟲」、「吸血鬼」來自投羅網了。

頓時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都沖著他而來。

據陳允吉先生回憶，被叫去勞改的祖父，因隨手揉了一團報紙擦汗，被紅衛兵煽了一個大耳光，報紙上有毛主席語錄。在跟這些紅衛兵差不多年齡時，祖父曾和毛澤東走在同一革命的路上，而文革時，卻遭到如此羞辱；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祖父曾和小叔一起服安眠藥自殺過一次，所幸藥物劑量大概沒達到致死程度。

文革時，我尚年幼。大概是怕被我們小孩子看到紅衛兵抄家、祖父被批鬥的樣子，就被父母寄放在外婆家。那時，我的外婆家被劃分為工人階級，聽說祖父的幾本特別貴重書籍還曾被偷偷放在我外婆家。至於是什麼書，母親也不知道。我也只隱隱約約記得一次週末隨父母回家，家具被搬動得亂七八糟。至於祖父曾經和小叔一起服睡眠藥尋死的事情，是在很久以後才聽說的。

二、家事往事

（一）「她今天還活著，總算是僥天之幸了」——祖母的故事

妹妹看到一篇關於「民國渣男」的文章後，來問我：「我們公公不是這樣的人吧？」我很自豪地回答說，當然不是！湖南人稱爺爺為「公公」，我和妹妹是公公僅有的兩個陳姓孫女。

我的大姑，即祖父的長女出生於一九二五年，所以祖父母的結婚當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之間。聽二姑說，祖父陳子展與祖母楊靜宜相識過程很浪漫！輟學後，在長沙自修大學宿舍「養息」的陳子展，一日經過私塾老師楊家門口，忽見裏面有一女子，（我的想像，大概）安靜、端莊，怦然心動，一見鍾情，私下打聽，得知是楊家閨女因抗婚未嫁。祖父立即托人說媒，成全了心願。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結婚時，祖父二十五歲，祖母二十三歲，在當時均屬晚婚吧。祖父是離家出走，而祖母是明確抗婚，好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這大概也是吸引祖父的地方吧。

祖父在三十年代大約寫過百萬多字的雜文、舊詩等，但是，涉及自己家人的內容少而又少。在祖父的雜文裏，我僅在四篇中找到關於祖母的內容。

「真討厭，糖師傅又來了，上趟小弟弟吃了他的糖菩薩，瀉肚子好幾天。他又來了！」

我同靜宜從黃包車上跳下來，就看見弄堂口上有許多小朋友圍著一個糖擔子。糖師傅正在口吹成一隻糖老鼠，用手捏成耳朵尾巴。靜宜從小朋友裏淘出我們的小弟弟，不免有些不耐煩了。

「你莫輕看糖師傅，他雖然在街頭上討生活，卻是一個藝術大師呢。」

靜宜聽了我的話，不覺笑了起來。她說道：「哪裏這許多藝術大師！」

——〈戴帽錫〉（《申報》1936年11月6日）

這是唯一一篇，不，是唯一一段有祖母音容笑貌的活生生的描寫，也是祖父母在一起出現的片刻。第一次讀到這一段時，心被深深震撼，一個和我的生命有著血肉關係的女性躍然出現在我眼前。後來每次翻讀到這一段，都感到像一個溫暖的擁抱。

前面已提到過馬日事變，當時，謝覺哉等人逃到祖父家，隱身一個月之久。而當時祖母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且身懷六甲；七月底，我父親出生，尚在襁褓中，就和母親一起入獄，後經人保釋出獄。十月，祖父帶著妻子和襁褓中的我的父親，幾經周折，從長沙轉道武漢，逃到了上海租界地，居住在巨潑來斯路美華里十五號。相隔四個門牌號碼，曾住著著名音樂家賀綠汀一家。賀綠汀跟陳子展一樣，也是湖南人，後來，兩人曾合作過〈背繯歌〉。

祖父陳子展和祖母楊靜宜之間共有五個孩子，其中第四個孩子，還在腹中，就被指定過繼給當時住在樓下的、曾當過孫中山私人秘書的于若愚先生做養女。據二姑說，祖父剛逃到上海時，作為「共首」之一，還是國民黨的通緝對象。一日，巡捕來到美華里找「陳子展」，恰逢祖父從外面回家，但巡捕不識祖父的長相，住在一樓的于若愚太太情急生智，大聲開罵：「你還回來啊，又在外面追女人啦！」祖父領悟，轉身逃走。為了報救命之恩，祖父母決定將尚在腹中的孩子過繼給沒有孩子的于氏夫婦。我出生時，繼父母都去世的小姑也已和家裏有來往。

祖母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七年裏，共生了五個孩子，其後得了嚴重的

腸結核。在祖父的雜文中，對此有過如下的描述：

卻說 1933 年 7 月 6 日，內子靜宜因腸病突然轉劇，急投紅十字會總醫院找紀唐醫師開刀，九死一生，幸而住院一個月，勉強救了一條命出來。

——〈談「橘」(下)〉

手術後，經常去一家德國醫生開的醫院看病治療，並接受醫生的指導，買當時尚屬奢侈食物的美國進口花旗蜜橘當營養品。

我吃了橘子以後，胃病不生變化，就勸內子同吃。內子起頭遲疑，不敢輕試。只因有一次她想吃了，就吃花旗橘子半個，覺得腸胃裏滿舒服。

——〈談「橘」(下)〉

內子的腸病，據醫生說，「這是一種很嚴重的結核病，非把這一段腸子截去不可」。但是，內子不敢冒險，我也未便勉強。醫生最初說她只能活半年，半年過了，又說她只能活一年。如今活過了三年，醫生說，「她的抵抗力特別強，調養得好」。「唉！病人生在我們這樣的家里，還能說調養得好麼？拖了一大群野馬似的孩子，住在大都市的狹隘的弄堂的房子裏，日光不夠透射，空氣也不夠新鮮，雞汁不能天天有吃，滋養的食料只靠橘子番茄，還常常慮及缺貨。不過她能夠常常吃到這兩種東西，似乎收了很大的效果，所以她今天還活著，總算是僥天之幸了。」

——〈又是橙黃橘綠時〉(《申報》1936 年 10 月 2 日)

祖父在這篇文章裏，對祖母闖過幾個關口，甚是感到欣慰吧。其實讓祖母度過幾次難關的，與其說是治療，抑或是「花旗橘子」，其實更多的當來自祖父的愛情。聽



祖母楊靜宜



祖父母陳子展與楊靜宜

二姑說：「小時候，爸爸關照孩子們在家裏不許吵架，不能影響媽媽休息。媽媽吃不下東西時，爸爸就親自下廚，做好了，輕聲喚媽媽吃一點，還一口一口餵給媽媽吃。」「這是真愛」，二姑說。

我手頭只有三張父親保存的祖母生前的照片。估計都是在上海拍的，穿著較淡色彩的、看似長袖的旗袍，燙著卷髮的一張，面頰豐腴；也許剛到上海不久吧，眼神很有自信。和祖父在一起的那張，略帶羞澀，卻有著滿滿的幸福感。泛黃了的那張，祖母坐在一張籐椅上，消瘦不堪，微笑也很無力，可能已經是病魔纏身，令人心碎。

父親的兄弟姐妹很少談及自己的母親，至少在我們下一代前，幾乎不談。最近和我的表妹（二姑的女兒）一起整理這些回憶時，才找到一點線索。「聽說祖母的生日好像是『鬼門關開的那天』」，二姑說。「那天是中元節，陰曆七月十五，祖母的生日應該是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吧」，表妹說。

祖母去世後，葬在北碚，因墓地在河對岸，一家人去掃墓時，要坐小船。有一次，風大浪急，孩子們嚇哭了，祖父就說：「你們再鬧，那就去媽媽那裏吧。」於是，孩子們都安靜下來了。

湖南人叫祖父是「公公」，我們家也沿襲了這個習慣。一日，忽然想，要是祖母健在的話，該怎麼叫。問二姑，說是在湖南，祖輩女性都被叫做「娵馳」(āijiē)。

我出生的時候，家在上海市區的長樂路上。祖父被打成右派後，就離開了復旦宿舍。先是搬到了吳淞路，後來，搬到了長樂路。這還是我出生前的事情。長大後，對自己住在長樂路，深感不解，偌大個上海，怎麼就選擇了這個地方，而且還是一個不錯的地方。直到二〇一八年夏天，二姑告訴我以前曾住在過安福路，才有點恍然大悟。安福路，和長樂路平行，相距不過五六分鐘的距離；那是祖父和祖母一家曾經享受天倫之樂的地方。大概在長樂路找到房子時，就毫不猶豫搬過來了。

小的時候，祖父常常帶我去散步，但是，去安福路散步，必定是一個人。小的時候不知道，只是以為路太近而已，現在想來，一定是祖父想獨自回味昔日和妻子在一起的時光吧。祖父晚年在安福路散步，不慎摔跤，跌斷了大腿，在華山醫院，第一次聽見和看見祖父大叫、流淚，現在想來，都一定和祖母有關。我不是一個很迷信的人，但是，人生過半，對人情世故必有種種關聯，已深信不移。

我的父親極少提及自己的母親，一則是父親不善於兒女情長，二來則大概是心中有太多的痛楚之故吧。對耄耋之年、神志已經恍惚的父親，我曾問及祖母的名

字，不料，父親竟立即大聲說：「楊靜宜！」那眼光越過我的肩頭，望著遠方，一種追憶之情，溢於言表。

（二）日常生活

小的時候，幾乎天天看見祖父在寫什麼。祖父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規律的，早上五點起床。吃完早飯後，就開始準備寫稿。《詩經直解》和《楚辭直解》的稿子都是用毛筆寫的，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小水壺的水放滿，然後將水滴入硯臺，開始磨墨。我有時會去幫忙磨墨，或者把小水壺的水裝滿。祖父開始進入寫作模式後，注意力就很集中，不再理會我們在他身邊做什麼。

大概為了構思文章內容，祖父常常滿房間踱步。儘管是穿著布鞋，但也能聽到祖父的腳步聲，很有規律，走來走去。有時也會去弄堂裏走，靈感來了，又回來繼續寫。我當時並不知道祖父在寫什麼，但是祖父的這個身影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終身難忘，終身受益。

記得祖父很得意地告訴過我，文革時，很多珍貴的資料被紅衛兵抄走了，祖父說到這裏，總是得意地用手指著自己的頭：「我的書都在這裏，我的腦子就是我的圖書館，他們無法拿走。哈哈哈哈！」他還跟我說，書最好借來看，這樣就會拼命去記。遺憾的是，這點沒遺傳好。

祖父一般上午伏案疾書，午睡後，就開始坐在沙發上看書。因為眼睛不好，所以祖父基本上是雙手捧著書，仰著頭，書幾乎要貼到臉上。記得那張單人沙發比較大，上學前的我就擠到祖父身邊，拿著自己的兒童書看，於是，祖父就開始教我念書，念得最多的是唐詩。我想，那時我一定是跟著祖父用湖南話念的，因為祖父只說湖南話。我的一個姑姑曾說：「你祖父是個頑固的人，離開湖南都有幾十年了，卻總也不改口音。」

上小學前後，最開心的事莫過於下午跟祖父一起出去吃點心。當時我們家在長樂路，出了路口到常熟路，往右走就是去淮海路，往左



祖父和我們姐妹倆

走就是去靜安寺。鍋貼、小籠包、生煎饅頭、春捲、餛飩，都是我們的最愛。吃完了以後，祖父總要讓我喝點醋，說是可以消毒。以至於至今我都愛吃加了醋的、酸味濃濃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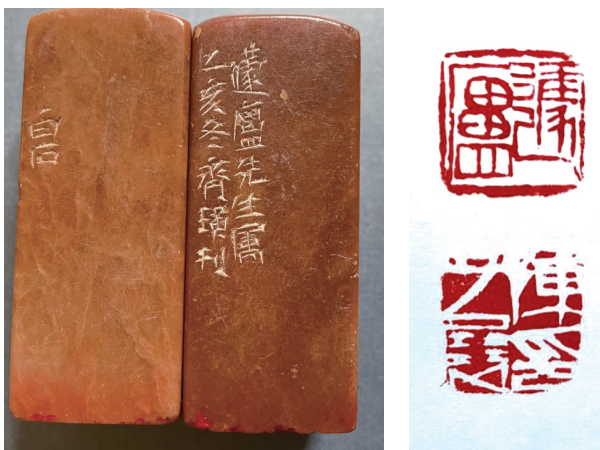
記得有一次我們竟走到了人民公園，在公園對面的人民飯店吃點心。一張桌子，坐了四個人：祖父和我，另有一個年輕姑娘和一個老婆婆。兩位老人聊了起來：「這是您的孫女嗎？」「是啊。」「多大啦？」「十八歲啦。」「是嗎？這是我的孫女，今年才八歲，再過十年也十八歲咯。哈哈哈哈哈！」我很清晰地記得這件事，因為當時我是十二萬分地盼著自己快快長到十八歲，盼著到十八歲還能跟祖父一起來這裏吃點心。今天，十八歲也離我已經很遠，但對這段往事的回憶依舊讓我感到親切。

帶我去散步時，祖父會嘖嘖叨叨地說過去的事情，徐特立、謝覺哉、李維漢、胡風、姚蓬子，還有魯迅等人的名字常出現在他的話題裏。其實，那時才七八歲的我並不瞭解話題的內容，直到長大以後，方才知道這些人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因為在我長大的家庭從來不對小孩子擺譜，所以，祖父對我來說，就只是一個微笑起來很慈祥、很和藹的老人而已。

那時，我們家弄堂前的長樂路是一段很奇特的路，幾乎不通車，尤其是長樂路口，僅為一條窄窄的石子路，大概只能過一輛小汽車而已。據妹妹回憶，祖父在外面散步時，常常和馬路對面的擺煙紙鋪的老太婆聊天，還會順便在老太婆那裏買些零食分給附近的小孩們吃。那些常來我們弄堂調皮搗蛋的孩子，看見祖父都會叫

「老公公」。

祖父的日常生活非常簡樸，房間裏也從不擺放什麼裝飾物，對穿著也不講究，唯一值錢的大概就是齊白石老人刻的一對圖章。這是世人大多知道祖父跟齊白石老人的一段佳話。概而言之就是：齊白石當年自稱：詩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畫第四。但祖父卻對此說不以為然，直言相陳：齊先



齊白石老人所刻贈的兩枚圖章

生的畫比他的字、詩、印的水準都要高，是占第一位的；他之所以把畫排列最後，是有意以畫來抬高其詩、其字、其印。此言一出，引起軒然大波，白石老人怒不可遏，指責祖父瞧不起他。但日後，白石老人卻精選了上等田黃，刻印上祖父寫雜文時最常用的筆名「蘧廬老人」中的「蘧廬」兩字和「陳子展印」贈給祖父，印身上則恭敬地稱祖父為「蘧廬先生」。這兩枚印章上，白石老人刻印的特色——單刀法和「斜筆」入印，盡顯其中。祖父生前很愛用這兩枚圖章，給人題字或贈書時，都會認真地蓋上這兩枚圖章。

（三）我有幾個「公公」

祖父的朋友於我，自然都是祖輩了，所以，小孩子打招呼，也必叫「某公公」，因而，我就有了一大堆「公公」。其中有幾個「公公」是我印象比較深的。

第一個當是「范公公」。大名，范祥雍，是祖父《詩經直解》和《楚辭直解》的校閱者。范公公本人也有幾本很了不起的著作，其中《洛陽伽藍記校注》是他畢生的大作。我常見他夾著書稿來找祖父。說常見，是因為我小的時候，范公公幾乎每星期六下午來我家，跟公公聊天。范公公來，家裏必要備點心和茶。清瘦、溫和的范公公，就是我小時候的印象。

《洛陽伽藍記校注》出版後，范公公夾著書來我家。祖父後來對我說：「這本書很了不起，可惜你看不懂。」祖父是很賞識范祥雍先生的才華的。大概是這個緣故，兩位老人經常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第二個是「李公公」。大名，李青崖。他送給我一本他翻譯的《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看的我很入迷，甚至突發奇想要給自己取個筆名，就叫「陳莫」。李公公給過我一個法國陶製人偶；法國女孩子，黃色的頭髮，古典的衣裙，頭部和身體是用鋼絲連在一起的，碰一下裙擺或頭部，人偶女孩子就會可愛地左右搖起來。李公公說，這是他以前從法國帶回來的，孩子都大了，就特地拿來給了我。如此推算，這個人偶該有一百歲了吧。我仍保存著這個陶製人偶，時不時碰觸一下人偶的裙擺，在人偶的搖晃中，追逐昔日的時光。

范公公雖然經常來我家，但跟我們小孩子交流很少，我們也就叫聲「范公公」打個招呼就完了。李公公則不同，常常會跟我這樣的孩子也聊幾句，也會順便告訴祖父自己孩子的一些事情。

第三個是「周公公」。大名，周谷城。周公公也是湖南人，而且跟祖父同齡。

記得周公公總是坐三輪車來，然後讓三輪車在外面等著，回家時，再坐回去。這點讓小時候的我也覺得周公公是個不同尋常的客人。

有兩次跟周公公的交流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周公公問我：「你念幾年級？」我隨口說：「兩年級。」因為上海話裏，「二」都是「兩」。不料，周公公很認真地糾正道：「不對，應該說『二年級』。」

還有一次，好像是我上初中的時候。周公公問我喜不喜歡歷史課，我不知道周公公是大歷史學家，隨隨便便地就回答：「不喜歡。」沒想到周公公聽了說：「不喜歡也罷，做歷史這個學問，就是像一個裁縫師，做件這個時代喜歡的歷史衣服罷了。就是補補丁喲，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歷史，就把一塊補丁放到合適的地方就是了。」原話，我已經記不全了，但是對「歷史」、「裁縫師」、「補丁」的用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聽母親說，周公公來我們家，和祖父談的幾乎都是吃，從這條街談到那條街，哪家店，什麼好吃，等等。周谷城先生後來去北京當了人大副委員長，在電視上看到他顫顫微微地被人扶到椅子上，方才知道當時坐著三輪車來我家的周公公原來真的是個重要人物，而我卻並不當回事。當然不光是我，我家裏人都是這樣，沒有人把高貴的朋友或地位什麼當回事。

還有兩位是我不曾謀面的「公公」，一位是「胡公公」，大名胡風。另一位是「田公公」，田漢。小的時候，常聽大人們談起「胡風」、「田漢」的名字，特別好記，就記住了。

提起胡風，父親後來跟我說，是你公公的打油詩救了我們全家。祖父擅長寫打油詩，其中一首就是關於胡風的，謂之「東風東吹，西風西吹，胡風胡吹」。

其實，祖父應該是很賞識胡風的才華的；重慶期間，祖父特地以中文系主任的身分邀請胡風到復旦任教。但是兩人之間好像誤會不斷，導致我祖父寫了那首打油詩。新中國誕生不久，就發生了胡風案件。我在日後讀到關於胡風冤案的種種資料，方才理解了父親的話。如果胡風跟我祖父關係好點的話，那麼，也許我的記憶裏會多一位「公公」，但也許就不會有一個安全的家了。

田漢，是祖父的好朋友，同鄉、同齡，又是同學，兩人在學校睡上下鋪。馬日事變後，祖父從長沙逃到上海，第一個向祖父伸出援手的就是田漢。據我二姑回憶，田漢和夫人安娥經常來家玩，跟祖父交流自己的創作。

人生後半期，兩人分道揚鑣，原因不明，大概主要是因為祖父不喜歡和官方

打交道，所以自田漢在國民政府以及後來在北京政府升任要職後，祖父就主動不再來往。二姑年幼時，多次見過田漢和安娥，並與他們的兒子田大畏成為好朋友。分手的時間和原因不明，但祖父跟田漢不再往來是事實，所以，我也失去了跟「田公公」相識的機會。

（四）祖父是美食家

祖父是個美食家，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吃貨。我小時候，祖父總會帶著我去附近的點心店吃點心。但逢有客人來，或者是祖父生日，我們就會一起出門去享受一頓美食。挑選上好的飯店，然後去吃那家的名菜。

我記得去的最多的是國際飯店。當時的國際飯店是上海市最高的建築物，只有三樓餐廳對外開放，祖父很愛吃那裏的北京烤鴨、清蒸鱸魚等。中午十一點開門，早已等在門口的吃客們就會盡全力奔跑去搶座位。父親和叔叔也會奔跑，母親提包，扶祖父上電梯則是我和妹妹的事情。當時國際飯店的環境和品味，都令人難忘。

衡山賓館的餐廳也是令我常常回想起的地方。記得以前那裏有個川菜餐廳，祖父對那兒的菜讚口不絕。有一次，僅一個蒜苗炒菜，就令我大吃一驚；原來蒜苗還能切成如此美麗的幾何圖形，白色的肉身很搶眼，外表的綠色反成了襯托。祖父告訴我，蒜苗轉著切，就會出現這種形狀。後來我也開始一根根地轉著切蒜苗，今天也仍然如此。

不過，祖父的最愛莫過於他自己做的泡菜、臘肉、臘八豆，這些都是祖父的拿手好菜。俞汝庸的前述文章裏對祖父的臘八豆有這樣的描述：

陳子展在生活上並不是一個完全大大咧咧的人，他曾教我母親怎樣做「臘八豆」，曾詳細書面寫過操作工藝程序和配料比例，很有一番「理論」。「臘八豆」是湖南的一個傳統佐飯食品，是將黃豆煮熟後涼乾，再去發酵黴變後製成的黴豆，由於無法試味，其中，放鹽多少是成敗的關鍵。陳子展總結出一斤黃豆放一兩鹽的規律，我母親試後，每次成功，成為她向別人推薦的「金科玉律」。

祖父的臘八豆味道不僅鮮美，而且很香。後來，祖父搬回復旦宿舍後，父親和我也一起做過，但時常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發酵過程中，我時不時偷偷地去揭開鍋蓋看。

臘肉必選上好的肉來做。記得有一年，祖父買到了一塊上好的肉，高興得不得了，掛在公用廚房的小天井裏，每天都美滋滋地去看。但是，到了快能吃的時候，臘肉不見了。大人們都說，是被貓叼走了。現在想起來，一定是被人偷走了。祖父很傷心，我很少看到祖父這麼傷心的樣子。祖父後來又重新買了一塊肉，再做了一次。因為，臘肉蒸臘八豆，是我們家春節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品。

湖南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泡菜，也是我們家的必備。祖父做泡菜，就跟他寫稿子一樣專注，蘿蔔必須切成什麼形狀，都講究得很。我小的時候，很驚奇祖父做的蘿蔔泡菜，看上去白白的，但吃到嘴裏能把你辣到跳起來。母親是上海人，表親們來我家，吃到泡菜，真的都辣到跳起來。我很喜歡看這一幕，不過，幾乎所有跳起來的人，日後都成了祖父泡菜的忠實粉絲。

還有一件好玩的事，祖父做紅辣椒泡菜的時候，當時我們家住在一樓，從我們家窗外走過的人大多會打噴嚏。牆外的這些人，可能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的噴嚏是由牆裏辣得要命的紅辣椒引起的。母親雖幫著洗，但是從來不切，一則因為會打噴嚏，二來是手指頭也會痛。

我的一個阿姨曾說，你公公的植物知識很豐富，野花野草都能叫得出名字來，還知道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記得那時長樂路的弄堂裏的六棟小洋樓之間都有個花園，長滿了野草。每到梅雨季節，祖父就會去挑馬齒莧。聽母親說，現在上海的菜市場也有賣了，可當時是沒有人吃的野草，味道酸酸的、澀澀的。祖父把馬齒莧洗乾淨後，用開水焯一下，然後把它們曬乾，到了冬天煮紅燒肉，香香的、帶點酸味。

每年入冬後，晚餐的餐桌上，祖父前面就會多一小盅白酒。小時候，不知道那是白酒，只覺得那個小杯子好玩，跟玩具差不多。於是，就問祖父那是什麼，祖父使用筷子蘸蘸白酒，然後讓我跟妹妹張開嘴，把筷子放到我們舌頭上，我被刺激到噙，而妹妹卻很高興，還張開嘴要。後來，祖父常常就要蘸點白酒放到妹妹舌頭上，再到後來，甚至剩一滴、兩滴給妹妹。妹妹現在是我們家唯一最會喝酒的人，她總是不無驕傲地說：「是公公教會了我喝酒。」

八十年代中旬，我去日本後，第一次回上海探親，想了半天，在東京超市買了海帶醬菜，心想，公公喜歡吃海帶，而日本的海帶醬菜煮得很軟，味道比較重，放在粥上，是個不錯的佐菜。沒想到，公公嘗了一口即呼：「我知道這個口味，在日本嘗過。就想有機會再嘗嘗。」沒想到祖父竟能記得近六十年前的口味！

（五）祖父的教誨——「工作著，是美麗的」

高中時，語文課上有寫自由作文的作業，也許是因為祖父當時正在寫《楚辭直解》，於是突發奇想，問祖父，《楚辭》裏有沒有什麼好的故事。

祖父馬上拿出幾張剛寫好的稿子，說這篇不錯，有故事。拿來一看，什麼都看不懂，於是，祖父親自給我解釋了一番。這也可以說是我唯一一次聽祖父上課。

祖父給我的這篇稿子是〈惜詠〉，按著祖父的解釋，我想像了一個英雄壯烈犧牲的故事。當時我在五四中學讀書，班主任劉田生先生也是個精通古典的老師，讀了我的作文，很吃驚問我為什麼選《楚辭》，我隨口就說，看了祖父的稿子寫的。對我來說，《詩經》也罷，《楚辭》也罷，就像家裏的生活用品一樣，雖然小孩用不了，但是每天都看得見、摸得著。劉先生知道祖父的名字後，一日，突然跑來我家見了祖父。

有一天，祖父特地把我叫去，給我看《新文學史料》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工作著是美麗的〉，介紹的是女作家陳學昭。《新文學史料》寄到後，祖父先看，我再看。一般祖父很少推薦什麼文章，我的記憶中也就這麼一次。

祖父經常對我說，女孩子一定要自立，要自己養活自己，他說，張愛玲的人生不可取，但是，她能自己養活自己，不需要靠男人。

當時我正在準備高考，面臨選擇什麼專業，將來做什麼的時候，祖父常說，學醫吧，學醫可以不求人。在我看來，「不求人，靠自己」幾乎可以說是祖父的一種信念。遺憾的是我沒有理科才能，只好學文。但是，祖父反對我學中文，說是麻煩太多，還舉出胡風的例子，說胡風出獄後，對自己的兒孫們說：「堅決不許學文。」所以，我選擇了跟中文沾親帶故的日語專業。不料，祖父卻高興得不得了，立即從口袋裏掏出錢來，說：「快去買詞典！」

祖父高興的理由是，學好了日語，將來可以當翻譯，外語是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的手段，又適合女孩子學。不求人，靠自己，回望自己的人生軌跡，幾乎就是按著祖父這個人生的標準一路走到今天，如今它已成為我的人生指標。

祖父在解放前的特殊時期，加入過共產黨，也加入過國民黨，但是解放後，祖父拒絕了所有的政治瓜葛，只專心作學問。祖父曾經告訴我，解放初期，大學方面叫祖父恢復黨籍，這樣的話可以升為一級教授，工資也可以拿到四百塊，然而祖父拒絕了，理由同樣是「能作學問即可」，「作學問才是最偉大的」。祖父二級教授的

工資是三百六十元。這也是祖父經常跟我提及的往事。祖父從來沒要求我或其他子孫後輩應該這麼做或者那麼做，但是，他的人生態度和工作著的背影，卻一直影響著我的人生。

用現在的話來說，祖父又是個很低調的人。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紅色代表證就被他隨便地放在抽屜裏，我也隨手翻閱過好幾次。大學中文系主任、二級教授什麼頭銜，對他來說也並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對作學問卻毫不含糊。《楚辭直解》的書稿曾給過一個某地方古籍出版社，祖父要求豎版和繁體字，而出版社沒按這個要求就出版了。祖父大發雷霆，對出版社的人說，不許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不要稿酬！這個出版社，竟然真的就橫板、簡體字地在沒有作者的名字下出版了《楚辭直解》。

當然祖父的「低調」是有原則的，他曾多次自豪地對我說：「我在五十歲之前，就被稱為『陳老』。」研究學問，始終是祖父人生的重要部分，可以沒有地位、沒有金錢，但是一定要有能研究學問的自由思想和精神。祖父的「低調」實則是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清高，是遠離世俗，遠離欲望的清高，是只活在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裏的清高。

「工作著，是美麗的」，也是祖父對自己生平的寫照。

（六）「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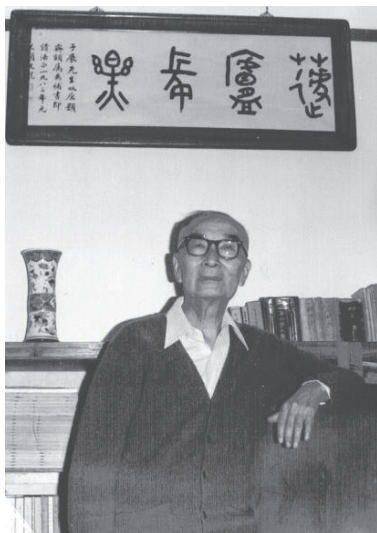
題字上有齊白石先生篆刻的印跡

在我去日本留學前，祖父親自給我寫下了這句題詞：「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這些話已經陪伴我度過了大半人生，雖然紙張已經泛黃，但至今仍掛在我的書桌前，告誡著我。

對「善」字該作何解釋？祖父從未提及過。對我來說，也許需要通過對祖父的人生的理解，才能感悟其內涵。

後世的人常用「硬骨頭」來評價祖父，最初聽到這個評價時，我很吃驚。因為祖父在我眼裏就是一個文弱的老知識分子，既沒

有豪壯的體魄，也從不會跟人相爭。但是在這幾年翻閱各種資料中，我開始有了祖父的「硬骨頭」形象。



晚年的祖父

十三歲投考長沙師範時，堅決不回老家的決心，使他哭喊著拍打開了學校的大門。馬日事變時，義無反顧地將共產黨人掩藏在自己家中，而從湖南長沙逃到上海後，就立下「終身從事文藝之志」。解放後，恩師徐特立先生請他去北京，但祖父幾乎沒有任何糾結地拒絕了，也從來沒有後悔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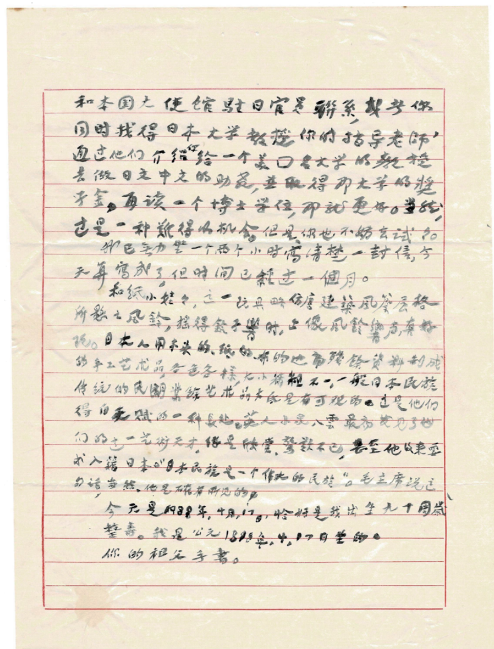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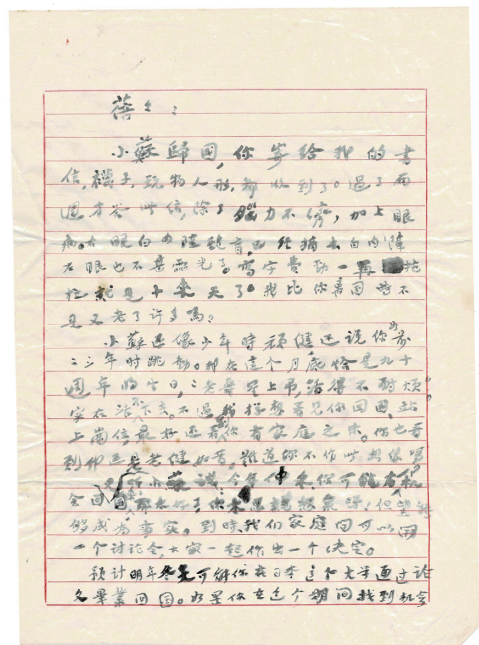
此後，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雖然不得不遊走在政治體制和文學研究中，但他始終以後者為優先，以至於為了保住後者，幾乎是義無反顧地一篇接著一篇寫拙劣的檢討交代。在祖父的交代中，我沒看到有揭發他人的內容。祖父沒有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名譽，而去揭露或攻擊昔日的友人、學者。他一直強調的是，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經與田漢斷交，沒有在老友遭難時，再踩上一腳；後又借寫過嘲笑胡風的打油詩，也不再去「乘勢打擊」。

但是，無論世道有多麼不公正、不講道理，祖父首先回到的是屬於自己的世界——研究《詩經》、《離騷》。如果說祖父是「硬骨頭」的話，那就是因為有「詩騷」在等著他、支撐著他。這種人生態度成為祖父的精神營養，並足以讓他抵擋外部世界的喧囂與雜遝。

這種強大，或許祖父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但是在經歷一個又一個生死場後，又馬上能回到自己的世界裏，對我的祖父陳子展來說，好像真的不是很難的事情，因為他的生命已依附到他鍾愛的「詩騷」的世界裏去了。

「善待他人，善待自己」，雖然俗了點，但我覺得可以用此來理解祖父的「硬骨頭」精神。

(七) 祖父給我的唯一手書信笈



蓀蓀：

小蘇歸國，你寄給我的書信、襪子、玩物人形，都收到了。過了兩周，才答此信，除了腦力不濟，加上眼病。右眼白內障致盲，已經摘去白內障。左眼也不甚靈光了，寫字費勁，一再拖拉就是十來天了。我比你離國時不是又老了許多了嗎？

小蘇還像少年時玩健，還說你如二三年前跳動。我在這個月底恰是九十周年的生日，「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實在活不下去。不過，我總想著見你回國，站上崗位，最好還看到你有家庭之樂，你也看到我還是老健如昔。難道你不作些想像嗎？又聽小蘇說，今年中秋，你可能有一個機會回國來，那太好了！你本思親想家呀！但望能夠成為事實。到時，我們家庭可以開一個討論會，大家一起作出一個決定。

預計明年冬天可能你在日本這個大學通過論文畢業回國。如果你這個期間找到機會和本國大使館駐日官員聯繫，或者你同時找得日本大學教授你的指導老師，通過他們介紹你給一個美國名大學的教授去做日文中文的助教，

並取得那大學的獎學金，再讀一個博士學位，那就更好。當然，這是一種難得的機會，但是你也不妨去試試。

我已無力坐一兩個小時寫清楚一封信，今天算寫成了，但時間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和紙小娃娃，這一玩具略仿唐建築風簷層格所懸之風鈴，搖得鈴於響時，（發）出像風鈴響聲，真好玩。日本人用木頭的、紙的布的邊角殘餘資料製成的手工藝品，各色各樣，大小精粗不一，一般日本民族傳統的民間業餘藝術品大抵是有可觀的，這是他們得自天賦的一種長處。英人小泉八雲最初發現了他們這一藝術天才，很是欣賞，驚歎不已，甚至他後來要求入籍日本。「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毛主席說這句話，當然，他是確有所見的。

今天是1988年4月17日，恰好是我出生九十周歲整壽。我是西元1898年4月17日生的。

你的祖父手書。

這是祖父給我的唯一一封手書信割。開頭提到的小蘇是我的堂姐夫，那時我到日本留學的第二年，他來日本出差，給我帶點東西，順便也帶點東西回上海。那時，我買了個日本的小禮物給祖父，一個和紙做的風鈴。

祖父對我有如此強烈的思念之情，至今仍讓我愧悔不已。因為，祖父的期待，我幾乎一個都沒實現。

今天重讀祖父手書的信割，我又若有所悟。祖父似乎希望我去美國，也許這是祖父在遺囑中寫的「想蹈未蹈的東海」的目的地。而祖父寫的「到時，我們家庭可以開一個討論會，大家一起作出一個決定」，又讓我沉思至今，因為當時的我並未好好思考過這句話的分量……。

這封信中最讓我不解的是祖父自己寫的生日：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七日。四和七，非常清晰寫了兩遍。而現在所有的資料上都是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其實，很慚愧，在這封信之前，我也並沒有很清晰地記住祖父生日的日子，所以，後來也就一直以為是四月十七日。問了二姑，她斬釘截鐵地說：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四月十七日，這個日子或將成為永遠的「謎」。

祖父去世的那天，一九九〇年四月八日，我好像有預感。那天下午起，我就在日本的小租屋裏坐立不安，做什麼都上不了心，看書不行、寫日記不行、打毛衣也

不行，焦躁、焦慮、淚水，一齊湧上來的時候，我突然悟到，會不會是祖父走了！那時，小租屋裏沒有電話，又已是深夜，所以熬到早上，奔到電話亭打個國際電話回家。果然，父親證實了我的預感。聽父親說，祖父自己拔掉了維持生命的所有的針頭……。

就在此前的兩周，我回上海，去華東醫院探望祖父，告訴祖父我快要結婚了，他很高興。但是，當時來巡診的醫生用上海話對我說，祖父的生命已不長了，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因為我知道，祖父雖然不說上海話，但是完全能聽懂上海話。我回頭看了祖父一眼，祖父的眼光望著很遠的地方，我知道，祖父聽懂了……。

祖父是來跟我告別的，我相信。掛了和父親的電話，我買了一束鮮花，一個人去了祖父也曾到過的江之島，將鮮花撒到了大海裏。那天，從江之島眺望瑰麗的夕陽消失在巨大的富士山旁邊，我漸漸領悟到，祖父生命的足跡停留在那麼多的故事裏，只要我去翻閱，就能與祖父相遇。又幻想，天國的祖父是否已跨過「想蹈未蹈的東海」，來到了我身邊。